

河洛春秋

豫西敌后抗战(6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洛水怒涛：宜阳抗日故事(下)

当年宜阳敌后抗战，从开始就建有根据地。根据地有三大特点，第一是直接接受党的领导，大小战斗体现战略性；第二是群众基础好，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了，心红胆壮，一心抗日；第三是有牢固的防线，敌人很难突破。其中，赵保(赵堡)抗日根据地被誉为“红赵堡”，最令日寇头痛。

豫西地下党负责人张剑石长期在赵保一带活动，伊洛专署和伊洛抗日军分区也都设在赵保。赵保人民抗日持久坚韧，果敢顽强，这里

讲的第一个故事叫“王抒歌担当伪县长”，体现了民众的高度觉悟。

王抒歌毕业于燕京大学，时任赵保屏阳中学国文教员，该中学抗战气氛浓厚，张剑石曾任校长。1944年春，日寇烧掉校园里的古建筑玉皇阁，王抒歌被迫往山中转移，途中遭遇日军骑兵，被抓到骑兵团总部。

凡被抓到这里的人，不是死就是伤，王抒歌却被日军翻译官叫住了，原来翻译官是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。日军了解这一情况后，认为王有知识，又熟悉宜阳情况，决定让他当宜阳县县长，帮助日军维护地方治安。

日军没料到王抒歌会当即拒绝，他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绝不会当你们封的县长。”敌人不死心，装作关心的样子说：“王先生不用急着答复，可以考虑几天。”但他利用这几天时间伺机逃脱了。随后，王震、王首道率领八路军抗日南下支队路过赵保，听说此事后，慕名拜访王抒歌，鼓励他一同抗日。他欣然答应，随后举办青年训练班，为延安抗大和八路军输送了100多名优秀青年。

第二个故事是“张剑石开辟赵保根据地”。

张剑石生于1903年，赵保乡东赵村人，也是知识分子，1929年入党，1930年11月，他发展同村张达人、张瑞修入党，赵保党小组宣告成立。当时举行的宣誓仪式庄严简洁：他们在雪地上画“镰刀斧头”，心窝里装革命大志。随后，党小组大力发展党员，至1932年7月，他们已在宜阳发展党员130多名。

张剑石为宣传抗日，在赵保创办屏阳中学和大众图书馆，从八路军驻洛办事处运来进步书籍供群众阅读，传播革命火种，使赵保成为豫西抗日救亡最活跃的地区。

1944年5月，日军侵占豫西，张剑石与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取得联系，在皮定均、徐子荣的帮助下，伊洛专署、伊洛抗日军分区相继在赵保成立。至年底，赵保抗日武装发展到300余人。

日军要拔掉这个根据地，6月27日出动200多人，从赵保东10公里的白杨镇

出发，由汉奸引路，翻译陪同，日本指挥官骑着马，拿着望远镜，带着军犬，耀武扬威。我方指挥狙击战的是张达人，他根据张剑石的指示，在敌人必经的山路窄狭处设路障，事先砍下大量刺槐、泡桐、荆棘，铺在路上。

敌人以为移开这些树枝就可以通行，谁知他们在移动树枝时牵动了隐藏其中的手榴弹弦，轰隆轰隆，炸伤多人。我300多名游击队员同时开火，打着了树枝，浓烟一起，敌人看不真切，只有被动挨打，乱作一团。游击队员又燃放鞭炮，噼里啪啦，喊声大起：“抓活的！抓活的！”远近山谷，似有千军。敌不知我方有多少伏兵，犹豫不决，最终退去。

1945年1月5日，千余名日伪军再次围攻赵保，张剑石让大家紧锁寨门，严阵以待。6日下午，敌冲至离东寨门不足300米的地方，张剑石调来两挺机枪阻敌，同时派一个小分队出南门，迂回到敌人侧后方，突发袭击。敌人无心恋战，匆匆离去。

至1945年，张剑石领导的赵保抗日根据地，军政人员达千余人，进行过多次战斗，打得周边敌人胆战心惊。

第三个故事是“黑山三壮士”。我们过去看电影，知道有“狼牙山五壮士”，其实在抗战时期，宜阳出现过“黑山三壮士”，他们是八路军五分区(伊洛军分区)基干二团三营的王丙钧、陈富堂、赵富林。其中，王丙钧是副营长。

1945年春，王丙钧带领20多名战士

到黑山执行任务，不料遭遇300多名日伪军。黑山在赵保以南17公里，荆棘丛生，三面悬崖，只有西南一条小径可通山顶。日伪军发现这一情况后，仗着人多，高呼：“抓活的！”他们在机枪掩护下，控制了下山通道。

王丙钧对战士们说：“我们的退路已被截断了，但不管敌人有多么凶猛，我们都要战斗到底，决不给八路军丢脸！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决不投降！”战士们齐呼“战斗到底”，然后攀上山顶，居高临下，向敌人射击，击退敌人十几次冲锋。

战斗打了5个小时，敌人未能登上山顶，但到后来，我方子弹打光了，敌人趁机发起疯狂进攻。王丙钧见两个战士开始用石头砸敌人，就大喊：“山是我们的山！石头是我们的石头，狠狠砸敌人！砸！”面对敌人，战士们个个英勇，没有一人退却。

打着打着，王丙钧发现北面悬崖似可突围，决定带陈富堂、赵富林留下掩护，就对副连长李敬先说：“我有一颗手榴弹，我们三人留下掩护，你带战士们快快突围！”李敬先说：“大家一起突围！”王丙钧说：“这里必须有人阻敌，这是命令，执行吧！”

于是三人留下阻敌，其余人跳崖突围成功。

敌人已知我方没有子弹了，兴奋地喊着“抓活的！”很快攻了上来。王丙钧、陈富堂、赵富林见敌已近，慢慢后退，摔毁枪支。等敌人靠近时，王丙钧突然拉响了手榴弹，与围上来的六个敌人同归于尽。

河洛春秋

洛阳曲剧往事(16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“曲剧窝”里的曲牌革新

在豫西，汝州、汝阳、伊川一带被称为“曲剧窝”，在曲剧发轫、发展的清末民国时期，这一带涌现出许多曲子大师，是曲子衍化为曲剧的中心地带，这里重点介绍一些曲牌的诞生和创制过程。

清末民初，豫西农民喜欢踩高跷唱曲儿，那时曲剧还没形成，他们唱的都是“曲子”。他们成立的曲子社班属于农民艺术团体，结构松散，农忙时各自回家种地，农闲时集中起来，共唱曲子，互称“玩友”。

玩友经常聚会，天长日久，情投意合，其中伊阳(今汝阳)、汝州的玩友聚在一起，结拜成以马清波为首的“金兰七兄弟”：老大马清波，伊阳城东人，踩跷扮和尚。老二朱万明，汝州郑铁炉村人，原扮大姐(姑娘)，后改扮老旦，还任琴师，兼制曲牌。下面还有老三李富生、老四王少阳、老五王少焕、老六关云龙(一说关遇龙)、老七卢天德。七兄弟中，马清波、关云龙具领导才能，负责联络玩友。朱万明精于业务，专事艺术研究。

当时高跷曲低沉冗长，与欢快的高跷舞蹈不相适应，豫西人讥讽为“憨扭憨唱”，朱万明下决心革新它。说来也怪，他不识乐谱，却会弹三弦、拉坠子，他用“咙格咙格咙

格咙”来哼改过门。他对创制曲牌有大贡献，其中的“书韵”、“小汉江”、“慢舵”的诞生皆有故事。

当时战乱频仍，连年灾荒，迫于生计，“金兰七兄弟”常到外地演出，顺带贩布做生意，这就有了借鉴外地先进经验来革新曲牌的机会。1921年春节，朱万明等人到汝州城踩跷唱曲子。晚上，大家听了山东琴书，对其中一个曲牌很欣赏。朱万明躺在床上，哼唱揣摩，觉得有趣，就想把它引入高跷曲里，但一夜未眠仍找不到“线头”(灵感)，织不成“毛衣”(曲牌)。天快亮时有了机缘，住在隔壁的私塾先生晨起背书，抑扬顿挫，有韵有辙，音调很美。

这不是现成的素材吗？朱万明大悟，便把山东琴书的那个曲牌和这位先生的背书声调掺兑糅合，按照扬调四句一板的格式，创造出一个新曲牌，叫做“书韵”，不但名称雅致，也很适合剧中人物用来抒情。

1923年，玩友们到汉口贩卖土布，在波涛滚滚的汉江边上，忽闻妇女哭声，那妇女也是河南人，她唉声呀呀地哭着，哭中带唱，唱中有泣，诉说家中有公婆儿女，遭了荒灾，饿得要死，为了救活家人情愿卖身云云。

哭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众玩友听罢，都说这妇女的哭诉有艺术成分。夜宿旅店后，他们又议论此事，朱万明对玩友说：“你们看啊，这妇人哭诉的内容都是现实中的不幸，发自内心的，有腔有韵，我想按她的哭声韵调编一个曲牌，融到曲子里，来唱苦情戏……”大家都说好，这就是革新！

从此，朱万明天天模拟哼唱，他以曲牌“汉江”为底子，哼出了叹音，又经发挥，创出一个恨天怨地、让人听了心碎的曲牌。他让玩友先听听效果，结果一试，如泣如诉，人人痛心鼻酸，个个潸然泪下，成功了！新曲牌诞生了！他给这个在汉江边上诞生的新曲牌起名叫“小汉江”，把原有的曲牌“汉江”易名为“大汉江”，以示区别。事实证明，“小汉江”在此后的曲剧唱腔中颇能引起共鸣，很能打动观众。

实际上，曲剧之所以能打动百姓，与这些从百姓苦难生活中衍生的曲牌大有关系，我们看《卷席筒》时，会被小仓娃的哭诉打动，不由得掉眼泪，这是因为旧时的豫西不但是“曲剧窝”，还是“泪水窝”。军阀混战和连年灾荒，使得人民苦难深重，他们最爱听苦情戏，最爱看悲剧。而艺人们也是一肚子苦水，戏里只要有三分痛苦，他们便能唱

出五分悲凉，加上舞台音乐的渲染，便能营造出十分酸楚。

1932年，朱万明从陕西贩土布回来，搭坐黄河木船。刚上船时，水势平缓，人心安稳。不久，船入峡谷，激流涌荡，船儿时而抛上浪尖，时而被冲进漩涡，舵手双臂撑舵，神情专注，随机应变，驾驭自如。善于观察的朱万明，发现船涉险境时，舵手的眼珠子都瞪圆了，水手们喊的号子很高亢。船入平流后，舵手神情放松，号子也悠扬平和了。

这就是节奏！紧张与放松，攒劲与松劲，其中就有上下韵！朱万明依托这个音乐素材，设计了一种表演惊悚紧张之后的高兴欢愉新曲牌，后经反复哼唱，创制了经典曲牌“慢舵”。这个曲牌是在黄河上诞生的，其他曲牌也都是来源于生活——曲剧给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。

